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黄绍箕集

上

谢作拳 点校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黄绍箕集

(上)

谢作拳 点校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绍箕集/谢作拳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18.9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ISBN 978-7-101-13333-2

I.黄… II.谢… III.黄绍箕(1854~1908)-文集
IV.Z4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44015 号

-
- | | |
|-------|---|
| 书 名 | 黄绍箕集(全二册) |
| 点 校 者 | 谢作拳 |
| 丛 书 名 |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
| 责任编辑 | 李闻辛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4 $\frac{1}{8}$ 插页 6 字数 760 千字 |
| 印 数 | 1-2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13333-2 |
| 定 价 | 118.00 元 |
-

黃紹箕

幼名睦鈴字中弢一字穆琴行一又
 行三咸豐乙卯年正月十二日卯時
 生浙江温州府瑞安縣民籍廩貢生

始祖鳳宋田孝廉授河南
 始遷瑞安府陳留縣令

之白巖里

二世祖勝

三世祖份宋紹興乙卯進
 士授處州通判

四世祖德明

五世祖永寬

六世祖定宋贈勳奉郎著
 有東郊舊廬三

卷

七世祖本潤

太高叔祖槐童試冠
 軍庠生

高叔祖其淵庠生

本生曾胞叔祖禹音武音

會堂叔祖象坤國學生象金國學生象貞

曾從叔祖大泉

曾再從叔祖得金俊傑知三

會族叔祖錫光元光緒光燦雲峰職

本生胞叔祖慶人字慶堂

望又且齊人

潞河词

木蘭花陸 泊頭舟中寄都中錢別諸君

耕桑留客去 回首中吳空曉 算昨夜 益信今宵 題目 日 齊河 並時 不 色 李 展
更看誰射虎 了殘年 芳嚴 回春 打漿 吟 仙 靜 臥 鳴 腔 甚 盛 豐 稔 度 好
春 遙 美 正 裁 盈 眼 正 虛 碧 波 輕 綠 柳 綠 柳 青天 夢 中 風 濤 弄 曉 作
推窗 鏡 月 枕 邊 園 主 在 知 指 之 官 思 夢 孤 負 華 筵

前調 潞河舟中寄答鵲泉檢校並簡菊人仙侍

市鷁揚柳岸 誰念我 征篷 浪 海 較 趁 春 定 商 語 夕 相 見 匆 匆 未 永 滿 座 芳 斛 科
內人 倩 弄 弄 弄 聲 鐵 笛 金 眸 袂 席 東 鱗 西 水 話 龍 古 來 羞 越 易 越 風
悲 歌 美人 同 正 勢 馬 倚 歸 故 界 微 承 蠟 淚 銷 紅 孤 中 主 天 一 極 臨 環 漱 手
長 統 管 管 為 向 伊 人 以 玉 人 謂 菊 何 年 尋 西 夢 色

中國教育史

沈曾植署檢



《中国教育史》书影

校邠廬抗議

翰林院侍講_臣黃紹箕謹議

前 言

黄绍箕(1854—1908),幼名睦钤,字仲弢,又字穆琴,晚号鲜庵,别署召斋居士、斤竹山人、鱼羊山人等,浙江瑞安人。黄体芳子,幼承家学,后受业于陆尔熙之门,又从南皮张之洞学。光绪五年(1879)参加己卯科顺天乡试,中式第十九名,保和殿覆试一等第一。六年参加会试,中二甲第六名进士,改庶吉士,充武英殿协修。九年四月散馆,得一等第一名,授职编修。十一年三月充本衙门撰文,五月任四川乡试副主考,十二月,充国史馆协修官。十二年五月充教习庶吉士。十三年十一月充会典馆协修官。十五年二月因恭办大婚典礼保奏加侍讲衔,十二月充会典馆图上帮总纂官。十六年五月二充教习庶吉士。十七年京察一等,六月充会典馆图上总纂官。十八年三月充武英殿总纂官。二十年京察一等,奉旨记名以道府用,十二月充会典馆书上总校官。二十一年正月充会典馆图上帮提调官,三月请假回籍修墓。二十三年六月充湖北乡试正考官。二十四年四月补授翰林院侍讲,五月三充教习庶吉士,九月补授左春坊左庶子,十月充京师大学堂总办。二十五年二月,补授翰林院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三月,充咸安宫总裁。五月授翰林院侍读学士。七月,会典告成请奖,奉旨赏加二品衔。三十年九月充编书局监督,次年正月兼充译学馆监督。三十二年简放

湖北提学使。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08年1月26日)病逝于湖北。

一 爱国士大夫

早在光绪六年,因日本侵占琉球,而清政府只妥协退让,黄绍箕就已赋诗:“中山世泽附滕邾,王赫雷霆怒覬觎。已报金缯输冒顿,岂容弓钺遑倭奴。故乡草木知多警,上国威灵不可渝。战备因循和议误,圣人原不薄迂儒。”对日本的侵略表示极大愤慨,同时也对朝廷的懦弱提出了严厉的指责,表达其爱国热忱。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后,黄绍箕倍加关注。在战争的后期,黄绍箕抵京销假后,在京师把得到的消息写信告知江苏学政任上的父亲黄体芳,内容涉及中法战争的各个战场,有镇海之战援台二轮被击沉的真相;广西镇南关失守与收复;台湾二刘不和;张之洞拨军饷给刘永福;张之洞对张佩纶马江战役失事的看法;清廷谋求与法议和的种种迹象等。并借张之洞之言“何以不责十馀年之总督,而专责到防数月之会办”,为与父亲关系密切的张佩纶辩解。

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之后,清政府日益腐败,外患日逼,慈禧太后掌握国柄,光绪没有实权,随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分化,不满后党的官僚、文人、名士日益增多,翁同龢等竭力结纳以清议见长的士大夫,黄绍箕与文廷式、张謇、沈曾植、盛昱、丁立钧等时相过从,形成帝党。在政治活动中,逐步提出自己的主张。光绪二十年九月,黄绍箕与张謇、丁立钧等申议联

络英、德以抗日,由文廷式领衔上奏《奏请密连英德以御倭人折》,随之黄绍箕又附名上奏《豫阻和议公疏》。十一月,附名上奏《劾海军罪帅公疏》《进呈地营图说公疏》,十二月,附名上奏《阻议和遣使公疏》。二十一年,马关议和,割地赔款,黄绍箕与同仁联名上奏《豫争和款割地公疏》与《统筹和战事宜请开廷议公疏》,反对割地赔款,指出如“割东三省之地,则俄必随之;割海口之地,则英必随之;割南省之地,则法必随之”。后果就是“非惟永远无自强之日,抑且旦夕无苟安之时”。体现其爱国情操及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在《致胡宝仁书》中指出:“东事外误于北洋,内误于政府,败坏决裂,遂致不可收拾。现在议战无方略,议和无界限,议迁无章程。当轴处置军事,料揣敌情无一不极昏谬。”对清政府的无能昏谬,进行无情的批判。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黄绍箕侍父请假回籍修墓,于九月下旬抵达江宁,适康有为抵南京说服署两江总督张之洞支持开办强学会的南方各分会,上海强学会由黄绍箕、梁鼎芬、康有为等人先办。由于黄绍箕患足疾,梁鼎芬准备回湖北,上海强学会实际由康有为一人主持。十月初十日,黄绍箕、梁鼎芬、康有为三人联名的电报通过两江总督署发出:“诒在京师,与洪右丞、沈子培、杨叔峤诸君开强学会,专讲中国自强之学,朝士集者百数。今来金陵,与南皮言,南皮力主之。顷分设沪局,集天下贤士夫,刊布公启,必欲得公名,以光此举,立候电复。金陵督署绍箕、鼎芬、祖诒。”广邀天下有志于“自强之学”的贤士夫参与。黄绍箕还参与《上海强学会章程》的议定,并负责康有为与张之洞之间的联系工作。十一月二十八日(1月12日),由康有为主持的《强学报》第一号在上海刊行,刊登“同人公启”,列名者有黄体芳、康有为、黄绍箕、黄绍第、梁鼎芬、

黄遵宪、张謇、汪康年等人。又由于《强学报》使用了孔子纪年,并刊发廷寄,引起张之洞的极大不满。十二月初八日黄绍箕从南京来到上海,此时康有为已回广东为母祝寿,黄绍箕不得已于次日致信康有为:“报纸二叶已诵讫,首列孔子卒后年月日,此为学西法,仍未毕肖,则责以违国制,已无可辞。于实事无丝毫之益,而于吾党恐有邱山之损。”“廷寄之件,止可云得之传闻。今直书某日军机字寄云云,一似有所受之者。家君在都,每闻人述时政,自诩为秘密消息,辄深恶之。况此竟列入会报,将来果有秘密消息,亦谁复肯以告我,以重其刺探漏泄之咎乎?”针对此二事的严重性做出分析,最后做出了“已告局中停报勿出,并议暂废此会”的决定。表明了黄绍箕虽然有维新思想,但不像康有为这般激进。

光绪二十二年(1896),黄绍箕在湖北,拟创办学会,已拟定大略章程,且“已奉旨准行,拟即仿京师之例,名曰书局……或称时务书局……或……自强学堂官书局”。终因九月需进京,在张之洞赠言“各自考求,随方联络,遥为声援”后决定暂不开办。

光绪二十四年(1898),康有为组织保国会,自任总理,黄绍箕出任常议员、宣讲员,积极投身维新变法运动。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决定变法,推行新政。六月初一日,黄绍箕入对,进呈张之洞所著《劝学篇》,奉飭广为刊行,实力劝导。全书贯穿“中体西用”精神,为光绪帝所接纳,又为慈禧太后所欣赏,体现了双重色彩。光绪帝还有意复古宾师之礼,将开懋勤殿,择康有为、梁启超、黄绍箕等八人待制,燕见赐座,讨论政事。说明黄绍箕虽支持维新变法,但思想上仍倾向于张之洞所持的立场。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下令将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重新刷印一千部,发给部院卿寺堂司各官签注意见,或加以评论。黄绍箕

对各条一一进行签议,认为“冯桂芬此书,准古揆时,运心至密。惟是时势迁变,弊习日深,就办法观之,则其不可行者似不少;就用意审之,则其可行者又似甚多。往往绌绎再三,殊难以一言遽决其可否,即臣所见以为可行,其中办法尚有宜别择者,有宜变通者,有宜推广者,故论说不能不稍加详,既逐篇系说,复揭其大旨,标于目录之下,以期简明”,其中对《制洋器议》发表以下评论:“南北洋之制造局,闽鄂之船厂、铁厂,业经先后开办,此议于今已验。惟官款支绌,扩充为难。拟请谕令海疆督抚,劝谕富商,自立工艺学堂,又制造必须机器。而制造机器之机器谓之机母,亦宜劝商设厂。凡事皆有本末,机器为制造之本,机母厂为机器之本,而工艺之学,又用机母以造机器之本也。”表明黄绍箕对发展近代工业已经有了相当知识。对《汰冗员议》的评论:“捐例盛行,每省道府以下少者数百,多几逾千,有不营缺而营差者,有缺之冗员可稽,无缺之冗员不可稽,蠹国殃民,莫此为甚。”《筹国用议》的评论:“近年通海漏卮,为旷古之奇变,姑就光绪年间计之,以洋关税册进出货值相抵外,每年漏出银数有多至二千馀万者,而购船械、雇洋人及交涉偿款等数尚不在内。统计二十三年中,漏卮总在五万万内外。”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当时清朝吏治腐败、财政困窘的严重情况。

八月六日(9月21日),政变发生,百日维新失败。此前一天,黄绍箕获悉确切消息,设法告知了康有为,建议康易服出京,北走蒙辽,于天未明离开,直奔山东,不要经过荣禄的辖地天津。后来康有为在英国官员帮助下逃往香港,幸免遇害。《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载此事。黄绍箕逝世后,康有为流亡海外,曾做长诗《哭前翰林院侍读学士、湖北提学使黄君仲弢》来悼念他。题下小记和诗,并载此事,诗称:“衔杯浙绍馆,泣语至深更。劝吾夜密走,胡服或

为僧。”题下记：“戊戌出奔，赖公告难。劝吾微服为僧，北走蒙辽。夜宴浙绍会馆，把酒泣诀。今幸更生，皆君起死人而肉白骨也。为服缞衰，东望奠祭，不知其哭之恸也。”而黄绍箕本人亦因与康有为等人的密切交往，险被慈禧太后治罪，赖大学士徐桐以百口保全始得免祸。

黄绍箕的政治才能深得张之洞欣赏，《郑孝胥日记》（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五日）载：“渡江至学务处，与仲弢同在抱冰堂饭，南皮从容言曰：‘今欲行新政，得数人亦可举耳，陈璧、张百熙、李盛铎、钱恂，及座间郑（孝胥）、黄（绍箕）二君。用此六人，可成小贞观矣。’”同年十二月初一日张之洞在《臚举人才折》中这样评价黄绍箕：“该员品端学博，沉细不浮，于中西政治纲领、学校规制实能精思博考，而趣向纯正，力辟邪说之说，洵为今日切于世用之才。”张之洞更倚重黄绍箕等人起草《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二 教育实践者

黄绍箕视教育为“身心性命之事”，提倡兴办新学，谓“不通西学，不足以存中学”。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1898年2月15日），诏谕开办京师大学堂。由梁启超起草《代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明确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重，观其会通”为办学方针。五月十五日（7月3日），朝廷正式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任命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刑部候补主事张元济为大学堂总办，黄绍箕等人任大学堂提调。张

元济辞去总办后,由李盛铎接任,不久李氏出使日本,十月,由黄绍箕接任。伍铨萃《黄绍箕传》评云:“时学务萌芽,科举未废,士夫或茫昧莫知其原。绍箕本中国教法,参考东西洋学制,手定管理教授规则,是为中国有学堂之始。”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开中国高等学校新学之先河,为我国综合性大学树立了楷模。

光绪二十六年(1900),黄绍箕丁父忧期间,受张之洞之聘,来到两湖书院,“讲堂操场,每日亲自督课,寒暑不辍”,使校风大有改进。同时负责选派优等生三十余人赴日攻读师范,并亲自护送至上海。这批学生学成回国后,作为教育骨干,又先后培养了数千名中小学教师,以适应创办新学的需求,为鄂、湘两省解决了师资不足的困难,对当时教育的改革和振兴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在辅佐张之洞期间,倡议建立湖北省学务处,总揽全省教育事业,被张之洞所采纳。在湖北实施并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光绪三十年向全国十八个行省推广。

光绪三十二年(1906),旅京浙江人士推举黄绍箕出任浙学堂总理,陈黻宸副之。四月(1906年5月),黄绍箕出任湖北提学使。学部大学士荣庆以黄氏学博中西,兼具外交才干,推为考察团长,率各省提学使赴日考察。六月,黄绍箕率团抵达日本,在日期间,认真听取日本文部省安排的课程,有关“日本教育之沿革”“论欧美教育制度与日本之比较”“日本兴学之经验”“各国学制及其变革”“日本现行教育制度”等内容。之后参观了日本的小学、师范学校、大学、女学校、商业学校等各类学校,以及图书馆、植物园、东京市政府、银行、医院、法院、监狱等场所。还频繁参加各类学术活动,发表重视教育的演讲,引起强烈反响。先后结识日本井上哲次郎、加藤宏之等教育家、汉学家,为中日文化教育的交流,开辟了新径。

回国后,因日本学制完备,人才济济,颇有感触,首捐廉俸二千餘金,充为教育经费,创办湖北师范学堂、湖北实业专门学校和武昌初等小学。并以武昌试点,在城区内外划分二十八个学区,动员各学区子弟就近入学。此举措在当今仍具有现实意义。他曾在文普通中学堂的开学演说中提到“环球各强国,所以能自立而日益强盛者,其真实力量全在国民”,如“通国皆成国民,必可出力扶助国家,我国无论到何地位必有翻身之一日”,表达了教育的重要性。

基于黄绍箕在教育方面所展现的才能,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光绪帝下谕,著张之洞与黄绍箕筹办曲阜学堂,三十三年黄绍箕还兼任湖北存古学堂提调。

在办学过程中,黄绍箕严格按照章程,激励学子好好学习,维护学生的权益。如在译学馆监督任上,有学生道上为俄兵殴伤,召俄教习谕之曰:“贵国兵伤吾学生,吾为君愧之。如兵官背法律,公使不顾国体,吾将译登西报,与文明各国判曲直,辞退贵教习,罢遣游学贵国学生。此监督权力所有,吾能任之,不复与君共事一堂矣。”俄教员愧惧,告诸俄使署。俄使知无礼,乃诘责兵官,登门谢,治犯者如律。但一旦发生学生闹事等不符章程之事时,亦据章办理,维护正常的办学秩序。黄绍箕听闻北路高等小学堂丁班学生罢考,即开除带头六名学生,对其他学生则从宽处理,不予追究。

黄绍箕十分关注家乡的教育事业。早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侍父归里后,就曾与孙诒让、黄绍第等联手创办瑞安算学书院(后改名学计馆),设立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该馆为我国最早专习算学的专科学校之一,由张之洞题写“学计馆”三字校牌。之后还从上海等地聘请英语教师,在薪金、住宿方面一切从优。当

办学经费不敷时,他与黄绍箕致函浙江布政使恽祖翼转陈巡抚,建议从温州盐局解款中提取白银四千两,存典生息,以弥补学计馆办学经费短绌的困难。光绪二十八年(1902)瑞安学计馆与方言馆合并为瑞安普通学堂(即今瑞安中学前身),公推黄绍箕为总理,孙诒让为副总理。

光绪三十一年(1905)浙江布政使兼省学务处总办宝棻反对设立温处学务分处,于是两府学界联合公电京师学务大臣,温州在京官员集合声援,推黄绍箕、徐定超为代表就近进言,管学大臣张百熙、孙家鼐认为可权宜办理以顺民情,并电浙江学务处特准分设。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十三日(1906年4月6日),《厚庄日记》载:“小垞与君雅信言灵溪事,道府均批县集讯。又云郡城中学堂,黄仲弢侍读、徐班侯部郎、陈介石主政来电,举孙仲丈为正监督,余为副监督。”

孙诒让在担任温处学务分处总理期间,遇到种种阻力,曾叹“众谤辟疑,纷然四集”,“荆棘丛生,极难措手”,曾多次得到黄绍箕的援助。

黄绍箕对教科书的撰写也提出了严格要求。光绪三十年,黄绍箕出任京师编译局监督,即手定《条例》:“宗旨必归于中正,凡奇邪偏宕之词,概从屏绝。”“教科书不可过于繁多,亦不宜失之漏略。”“国之所以成立,必有本原,一国之制度、风俗亦必有相承之习惯,其初皆自教育而来,故东西洋各国皆有教育史,日本所纂《内外教育史》兼述中国支那教育史略,则述而未详,于古圣先贤教育之要义未能发明,亟应自行编纂。俟书成时,令各处师范学堂先讲中国教育史,再讲外国教育史,以次及管理教授法,方为合宜。”并订定《编纂中小学堂教科书五要》,即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

其后被学部明文宣示为学堂教育宗旨。

随着科举制度的取消,新式学堂的兴起,教科书的编写提上了日程。时任京师编译局监督的黄绍箕率先提出“乡土”的概念,由光绪三十一年编订完成《乡土志例目》,由学务大臣上奏,下发到全国各地,成为编纂乡土教材的指导方案,“今之纂教科书者咸饬遗于是”。在传统的教育方式发生大变革之际,黄氏提出的这个纲领性的例目,使乡土教材“以为小学课本,庶可成完全之学科,迪童蒙之知识”,让小孩子了解自己家乡的历史、人物、地理、物产,激发爱国热情,“他日进学成才皆基于此”,开辟出一条成才之道。

黄绍箕在教育方面的业绩,深受国内外称颂。日本教育会曾颁赠“奖状”“奖牌”,举其为“汉学统一会”名誉会长。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08年1月26日)黄绍箕逝世后,湖北学界送殡者数千人。伍铨萃《黄绍箕传》称:“今日海内学校如林,教科成立,皆绍箕首先提倡之力。”日本学界推尊为“仲尼后一人”。

三 教育名著的作者

《中国教育史》是黄绍箕毕生教育经验的总结和教育指导思想结晶,本着“中体西辅”的指导思想,于光绪三十年(1904)着手编撰。

《中国教育史》五卷约十馀万字。发掘我国古代教育学说,介绍外国先进教育理论并用以评判前者。“自上古迄孔子,本实事求是之旨,多采诸子及古注旧说,间及阎百诗、阮芸台、汪容甫、焦里